

同治朝中国早期外交使团“新西洋” 形象建构的跨文化解读

罗选民 张雪颖

【摘要】晚清同治时期，随着外国外交使节常驻北京，清廷向西方国家派驻外交使节已不可避免。斌椿、志刚、张德彝、刘锡鸿等人作为晚清官方派出的最早一批亲身感受西方的蒸蒸日上和先进文明的外交人员，留下了内容丰富的游记体历史资料，形成了近代中国对“新西洋”形象的最初建构，然而这却是一种不自觉的形象建构。他们从考察西方物质文明、社会风俗再到分析其政治制度乃至文化结构，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和认识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晚清早期外交使节对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多持肯定态度，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依旧固守中国传统政教、伦理和文化等方面优于西方文明的观念，显示了早期驻外使节复杂的文化保守心态。国家形象由其自身软硬实力决定，国家形象只有在跨文化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比较才能得到多元的描述。

【关键词】外交使节；“新西洋”形象；跨文化解读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4)04-0204-09

同中华帝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是欧洲各国长期以来的愿望。但在东亚朝贡体系和清朝天朝上国、蛮夷之邦等传统观念的支配下，清朝统治阶层始终没有平等对待包括官员在内的欧美来华人员。法国学者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在其关于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出使清朝的书中指出，早在1792年9月，英国内务部长敦达斯（Henry Dundas）给即将出使清朝的马戛尔尼使团提出了7点建议，其中的第6条明确说：“要求向北京派驻常驻使节”。^①当然，马戛尔尼使团并没有完成其出使任务。随后，这种拉锯战又持续了60余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硝烟的散去，欧洲列强终于获准在北京建立常驻使馆。对此，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写道：“远征的大目标已经达到，外国可以庆祝在中国首都以平等条件派驻代表。两座王府（即梁公府和纯公府）立即由英、法代表所占用。随之而来的是其他国家的公使聚集在周围，在城市的东南角逐渐形成了外国居住区”。^②1866年3月，虽然对斌椿其人观感不佳，但时任英国驻华外交官密福特（Algernon Bertram Freeman-Mitford）还是指出：“斌椿此行，本身是件小事，但我们都把它看作是第一步。中国将会由此向欧洲派遣常驻使团，与我们在北京的关系也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③至此，清政府在与欧洲列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方面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由此，从同治朝开始，清政府正式或非正式地派遣官员出使欧洲或美国，早期的外交使团主要的有同治五年（1866）斌椿使团的出访、同治六年（1867）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使团的出

【作者简介】罗选民，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雪颖，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 530004。

①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9页。

② 卫三畏：《中国总论》下，陈俱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72页。

③ 密福特：《清末驻京英使信札（1865—1866）》，温时幸、陆瑾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150页。

访、同治十一年（1872）崇厚使团的出访等。此外，光绪二年（1876）还有郭嵩焘使团的出访。这些使团成员在出访过程中，大多有其对彼时欧美社会、风俗、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较为细致的描述乃至一定程度的思考，形成中国早期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的“新西洋”形象建构，既有研究对这些使节及其留下的历史资料已经有了一定的介绍和分析。^①晚清早期外交使节的“新西洋”形象建构具有独特的历史意涵，鉴于学术界从这一视角研究同治朝出访使团及其对西方社会的刻画成果相对较少，因而颇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早期出访西洋的清朝外交使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游历，清政府也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同西方列强的各种交涉事宜。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逐渐加深，清朝统治阶级中的部分上层开明官员逐渐意识到了解西方社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总理衙门指出：“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以致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此臣等所耿耿于心，而无时稍释者也。”^②调整外交政策，向西方国家派遣外交使团以及驻外使节，便成为不可回避且应当快速办理的重要“洋务”之一。

同治时期清政府派出的外交使团和驻外使节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欧洲国家派遣的官方代表，他们最早亲身感受到西方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文明成就。近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描述斌椿的欧洲之行道：“九州之外，数万里之遥，隔以大海，浩汗杳冥，巨浪如山，有望洋而叹者矣。即曰不畏风涛，视险若夷；而中外限隔，例禁甚严，苟无使命，虽怀壮志，徒劳梦想耳。故曰：游必有福。郎中斌君友松，少壮宦游，足迹半天下。一旦奉命往欧罗巴访问政教风俗，遂得游数万里之外。所历十余国，皆开辟以来，中国之人从未有至者。各国君臣，无不殷勤延接，宴会无虚日。宫廷园囿，皆特备车骑，令纵驰览。斌君之游福，可谓大矣。于是斌君凡身之所至，目之所见，排日记之。既恭录进呈，又刻以行世，令读其书者，亦若身至之而目见之也。然则斌君非独一人游，率天下之人而共游之也。”^③李善兰期待斌椿等人的欧洲之行能对中国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对其欧洲之行的向往与羡慕亦溢于言表。

斌椿，字友松，汉军旗人。同治年间，清廷欲派人前往西洋各国考察，恰好时任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爵士准备回国度假，提出可派一二名同文馆学生随同前往英国考察。同治五年正月初六日，总理衙门上奏朝廷同意了这一要求，并提出派“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因斌椿曾历任多职，性喜交游，具有相当广泛的知识；他又曾在赫德手下办理文案工作，与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也有接触，因此具有一点西学知识，故为总理衙门所委派。总理衙门“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④斌椿因此随同赫德一起出洋，游历西洋多国，成为“中土西来第一人”。回国后斌椿出版了游记《乘槎笔记》，为中国人了解当时的西方社会提供了一定程度上可资参考的材料。^⑤

作为清政府的官方代表团，斌椿的出洋考察，当时的英国媒体持热烈欢迎态度。1866年6月23日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报道说：

目前在伦敦的中国外交特使团包括清朝钦差大臣斌椿〔椿〕，他的儿子广英和三位文书，以及特使团英文秘书和翻译包腊（Edward Bowra），法文书秘和翻译德善（Des Champs），还有伦敦英国外交部派作中国特使随行副官的J. 布林少校（皇家陆军工兵）。在大清帝国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的钦差大臣是满族人，今年64岁。他见多识广，思想开明，目前任北京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他在文学方面才华横溢，自从来到伦敦之后一直在不停地写诗，因为他认为散文不足以表达自己对于欧洲艺术和科学奇观的看法以及他在英国所受到细致周到的礼遇。回国之后，

① 代表性的成果有刘洋：《近代以来对斌椿使团的历史书写——兼及如何认识近代的失语者》，《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9期；刘洋：《向西方遣使的首次尝试：晚清斌椿使团评析》，《历史档案》2019年第3期；尤淑君：《〈出使条规〉与蒲安臣使节团》，《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李峻杰：《“身临其境”之言：晚清早期出国官员的西方外交体验与近代外交知识的生产》，《新史学》2019年第2期；杨华：《“入国问俗”：张德彝对西方民俗的心态、体验与认识》，《民俗研究》2020年第6期；李娟：《一个保守者的思想转变与坚守——〈英轺私记〉中刘锡鸿的科学观》，《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等。

② 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86页。

③ 斌椿：《乘槎笔记·李善兰序》，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87页。

④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1页。

⑤ 斌椿：《乘槎笔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

他将会把他所看到的東西写成奏折，建议皇上引入欧洲的艺术和文明以及更改与欧洲“蛮夷”们打交道的祖传规矩。他已经访问了温莎城堡，并出席了在白金汉宫所举办的皇家舞会。他现在下榻于干草市场查尔斯街的新协和旅馆。在离开英国之后，他还将访问圣彼得堡、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柏林、布鲁塞尔、汉堡、吕贝克和巴黎。总之，他的特使身份得到了所有跟中国签订过条约的西方国家的承认，其中包括美国。钦差大臣在回国途中将顺访美国，横跨北美大陆，途经旧金山和太平洋回到中国，沿途还要造访日本和社会群岛。这样规模的环球旅行在历史上恐怕还没有别的中国人（肯定没有其他中国官员）曾经完成过。我们有理由为他的这次旅行不但向中国，而且向整个欧洲表示祝贺。它具有无比深远的意义，因为我们可以视其为中国的一个承诺，即它将冲破过去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人逐渐形成的妄自尊大以及他们对西方民族的无知和恐惧都将慢慢地被消除，最终必将创造一个人民诚实、机灵、耐心和勤劳，自然资源丰富的强盛中华帝国。它将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立于世界之林，并且分享兄弟国家的进步。这一结果将部分归功于外国列强的慷慨和克制，它们并不想乘人之危，来瓜分孱弱的中国，同时也归功于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和赫德等人多年来所做出的努力。威妥玛先生目前是英国驻华公使馆的中文秘书，而赫德则是北京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实际上担负着外交部长的职责。^①

这篇报道尽管表现了西方世界的“欧洲中心论”和殖民主义思想，但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此次斌椿的出使给予了高度评价，尽管该评价过于乐观。事实上，斌椿的出使对晚清政治与外交均未产生太大影响。密福特对他的此次出访也并不看好：“遗憾的是，清朝政府没有选个比斌椿更年轻、更聪明的人。斌椿都64岁了，满口胡言。据我所闻所见，斌椿和他的儿子，不会欣赏在欧洲看到的事物。因此，对于第一次出访欧洲，即使不具备官方身份，也应当选个比斌椿更重要的官员。斌椿带回来的报告，对中国士大夫阶层不会有多大的影响。”^②作为时任外交官和历史见证人，应当说密福特的观察是十分深刻的。

如果说斌椿使团仅仅是出洋了解西方风俗，那么同治六年（1867）的蒲安臣使团出访则是清朝官方第一次正式的身赴西方国家的外交交涉活动。总理衙门在十一月初二日的奏折中说：“现值修约届期，但与坚明要约，派令试办一年。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遽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旋奉旨：“著即派（蒲安臣）往有约各国，充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③在这一出使过程中，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会同蒲安臣前往各该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志刚，字克庵，满洲镶蓝旗人，因“朴实恳挚，器识阔通”而获得总理衙门的信任。总理衙门规定“遇有一切事件，详悉由轮船寄知臣等，以便斟酌妥办”。旋奉批准。^④这样，志刚和孙家谷得以充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获得了出洋的机会。他们于同治七年（1868）一月出发，后蒲安臣病故于圣彼得堡，同治九年（1870）十月使团归国。志刚归国后出版有《初使泰西记》一书。^⑤

同治十年（1871），清朝派崇厚使团出使法国，这次出访起因于天津教案。同治九年，“因天津教民起衅，法国驻津领事官丰大业者，性暴，未谙民俗，致于五月二十三日聚众争殴，酿成焚杀巨案。”^⑥“朝廷遣使修好，命充出使法国大臣，是为专使一国之始”。^⑦崇厚出访，随行人员中有参与外交的张德彝。张德彝，字在初，是第一批同文馆学生，曾以译员身份随斌椿赴欧洲游历，此次随崇厚往法国传递国书。崇厚使团于同治九年十月出发，同治十一年一月归国。随行的张德彝游历丰富，归国后有《随使法国记》一书出版。^⑧

同治末光绪初，清朝第一次派出以郭嵩焘、刘锡鸿为代表的使团常驻英法两国。其中任职副使的是刘锡鸿，字云生，广东番禺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举人。咸丰年间在家乡办团练获刑部员外郎等职，同治初年入广东巡抚郭嵩焘幕，同治五年，郭嵩焘曾保举刘锡鸿。^⑨光绪元年（1875）春，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在云南被当地人杀死。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此向清政府提出派人亲赴英国赔礼道歉。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以

① 沈弘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下，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518页。

② 密福特：《清末驻京英使信札（1865—1866）》，温时幸、陆瑾译，第149页。

③ 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册，第286—287页。

④ 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册，第289页。

⑤ 志刚：《初使泰西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

⑥ 张德彝：《随使法国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317页。

⑦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46《崇厚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557页。

⑧ 张德彝：《随使法国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2册。

⑨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2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0—311页。

郭嵩焘为正使、刘锡鸿为副使的使团自上海出洋，是年十二月初八日抵英都伦敦，并向英国女王呈递国书。刘锡鸿游历西洋，后来还担任驻德公使，直到光绪四年（1878）被调回，回国后有《英轺私记》出版。^①

从同治朝外交使团的活动可以看出，在形势的逼迫下，清朝统治者在对外交往中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过程，迈出了融入世界的一小步。当然，清廷决策者在最初办理外交的过程中，依然秉持满汉畛域之分的传统统治思路。对此，钟叔河曾指出：“六十三岁的斌椿被选派出国，这首先因为他是一位满人。清朝统治者不放心臣民和外国人打交道，尤其不放心汉族臣民和外国人打交道，深怕无父无君的思想会由此而散布开来。始办洋务时，上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下至同文馆招收的学生，都几乎是清一色的满人。只是在靠满人不能解决问题时，才被迫起用汉人，但这已经是稍后的事情了。”^②

二、晚清早期外交使团成员“新西洋”形象的最初建构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形象是建构的产物，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通过交往互动而被其他国家赋予的一种身份表现和身份认同。^③ 国家形象不是一个客观既定的、可以自我设定和传播的实在，而是存在于国家主体间的一种相互认同的关系。^④ “每个民族都有一套理解世界的模式，任何新的知识都必须整合进这一认知范式才能为大众所接受。”^⑤ 而中国对“西洋”的形象建构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历程，中西形象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其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前，“鬼化”或“妖魔化”的面目依然是包括绝大部分精英阶层在内的中国人建构的“西洋”形象。正如王寅生所指出的：“具体到中国，中国是文明的中心，是唯一可能的文明。中国之外要么是不知礼仪的蛮夷之地，要么是服膺教化的朝贡之国，中国已无法想象还会有其他文明可以与之平等。”^⑥ 其二，到了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又很快建构了以“富强”“文明”“进步”等词汇组合而成的“新西洋”形象。同光时期，正是中国重新建构“新西洋”形象的起步阶段，其中早期出使西方的外交使团成员本身就是重构西方形象的一支虽然规模不大但颇有说服力的重要力量，因为他们是西方世界的第一批官方亲历者，其留下的丰富文献又成为后人继续建构“新西洋”形象的重要素材。这样，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迥异于中国古代世界“鬼化”或“妖魔化”的西洋形象，以上述“富强”“文明”“进步”等为代表的词汇所建构的“新西洋”形象逐步变得丰满、充实、鲜活乃至于神话，并深刻植入近代以降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也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却从“地球上最文明的国家”变成了“落后”“停滞”“封闭”的“半野蛮”国家。

考察近代中国人对“新西洋”形象的重新建构，必须注意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描述和记录；二是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态度和评价或者说价值判断。总体而言，同治朝的外交使团成员对西方世界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社会风俗、各种发明创造、政治制度乃至于文化成就，并不乏肯定性描述。但是，一旦上升到中西文明或文化层面的优劣比较，除了郭嵩焘之外，绝大部分使团成员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中国传统固有观念的茧房中，对西方文化不屑一顾甚至于鞭挞有加。他们认为，西方世界虽然繁荣昌盛、物质成就巨大，欧洲在文化层面虽然与他们之前的认知相比，确实有许多值得肯定的成就，但与中华文明的政教、伦理、文化等相比，还差之甚远。

同治时期的中国早期外交使团成员对欧洲文明的成就的赞美，在他们的书中随处可见。斌椿对巴黎的繁华情景有详细描绘，“街市繁华，气局阔大，又胜于里昂。闻里昂人民六十万，都城则百余万。陆兵有三十万，街衢棋布星罗，皆黑衣红裾，持杖鹄立。看街之兵，往来梭巡无间。衣帽鲜明，无一旧者。车声粼粼〔辘辘〕，行人如蚁，皆安静无哗。夜则灯火通明如昼。”在巴黎，斌椿参观了动物园，观看了舞剧，拜会了各国使臣和官员。^⑦ 斌椿还游历了多国王宫，以猎奇的心态参观了这些国家的巍峨建筑，如描述英王行宫“陈设之富丽，甲泰西矣”。^⑧ 在参观中，斌椿感受到西方国家的繁华富丽。在随郭嵩焘出使的过程中，刘锡鸿的观察更为细致，英国给刘锡鸿的第一印象是繁华。“初至伦敦，拜会外部大臣后，‘乘便周游街市，衢路之宽洁，第宅之崇闳，店肆之繁丽，真觉生平得未曾见’；‘入夜，各街灯烛攒

①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

② 钟叔河：《中土西来第一人》，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第72页。

③ 参见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

④ 参见季玲：《重新思考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的概念与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

⑤ 王寅生编订：《中国的西方形象·前言》，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年，第6页。

⑥ 王寅生编订：《中国的西方形象·前言》，第6页。

⑦ 斌椿：《乘槎笔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第108—109页。

⑧ 斌椿：《乘槎笔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第115页。

光，火山星海，殆无以过”^①。第二点印象是英国人也讲文明，重礼仪：“向疑英人僻处海岛，惟知逞强，无敬让之道。乃上下同心，以礼自处，顾全国事如此。”^②不仅如此，他对英国政俗做了总体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到伦敦两月，细察其政俗，惟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全未之讲，自贵至贱皆然。此外则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两月来，拜客赴会，出门时多，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鼓舞欢欣。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③

在耳闻目睹泰西各国富强景象时候，大约斌椿、刘锡鸿等人的“天朝上国”心态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英国的政俗之美呈现出一个处于中土文明序列之外的社会形态，它们成为一个有强大诱惑力与冲击力的社会图景”。^④

对于欧洲近代的工业文明，斌椿等也有细致的观察，他们较为详细地描绘了其所见到的机器厂、电报线等。《乘槎笔记》记述了现代化的纺织工厂：“往织布大行遍览。楼五重，上下数百间。工匠计三千人，女多于男。棉花包至此始开。由弹而纺，而织，而染，皆用火轮法。总轮有四百匹马力（置长轴于楼屋最高处，分布小轮于各屋，均以韦条系于轴。轴总终日转，则万轴随转，无少停。轮下各设几案机器，工匠司之。纺纱织布，无虑千百人。机器震耳，靛面语不能闻也）……计自木棉出包时，至纺织染成，不逾晷刻，亦神速哉。”^⑤这是中国人对机器大生产最初的直观观察，虽然斌椿等人的认知能力尚不能使其明白其中的工作原理，但是机器工业的高效率对他们的心理产生了强烈冲击。

斌椿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有考察，如在英国参观议会大厅及议会中的辩论时，“申刻，至公议厅。高峻阔敞，各乡公举六百人，共议地方公事。（意见不合者，听其辩论，必俟众论合同然后施行，君若相不能强也。）”^⑥他对英国的政治运作模式也有描绘，还在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会见中对英国的政治制度与运作模式做出好评。女王问：“‘来此几日矣’？予答曰：‘来已兼旬。’又问：‘敝国土俗民风，与中国不同，所见究属如何？’予对曰：‘来已兼旬，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⑦十天左右观察，自然不能对英国的政治制度有深刻的认识，斌椿的回答，大约礼貌性的答复成分居多，但是说“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想必也是有感而发，至少在感性认知层面对英国政治制度还是存在一定的好感的。

与斌椿的《乘槎笔记》以记述景物、风俗、宴乐为主不同，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关于西方科技、军事、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记述占了主要部分，虽然大多也只属于感性认知，但对使团成员以及中国人进一步了解西方世界，具有积极意义。志刚详细描述了泰西各国的工厂、科技等现象，对军舰、机器厂、银矿等，都有细致观察，如其对于火车的描述相当细致，“其制如板屋，宽丈二三，长三之。鳞次设椅，椅三人，两行，八层，坐四十八人。两旁有连窗，玻璃、布帘、木板三层，备风雨明暗之用也。每车铁轮四。前为火轮机车，御人司之。后二煤车，执役者司之。其机运动之法，与上海局之火轮机同而用殊。每火车可拖十数车，二、三十车。煤车之后，三、五车载重，又后乃坐人，再后载行李。前车燃煤，蒸水鼓气，由管入于气囊，鼓橐干伸缩以运轮，而车于以行。”^⑧志刚的记载对火车的外观和内部运行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还简要介绍了铁路建设的方法。这些入门知识的介绍，加深了中国人对铁路知识的认知，或许也含有清廷应该学习和借鉴的意思。

1871年崇厚使团出访时，随行人员张德彝在法国的观察与记述也颇有历史价值，他的《随使法国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极大影响欧洲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历史。“《随使法国记》的发现和出版，改变了史学界的看法，很快便引起了法国的巴黎公社史和巴黎史学者的注意”。^⑨张德彝此次随使法国，担任崇厚的英文译员，这个23岁的年轻人，已经是第四次进入法国了。张德彝和崇厚及其他人不同，他精通英文，且多次游历欧洲，相对而言，他比较了解西方的政情和社会。张德彝对欧洲社会尊重女性的礼俗和重视男女教育平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写道，“西俗女重于男。因女不吸烟，故凡遇妇女在座，男子不吸，以昭敬重。而妇女有故示体恤者，乃于晚餐后先出饭厅，以听男子自便。又，西人喜净，早晚饮食之际，男女以及童稚，入座必先更衣、漱口、浴面。饮食不得有声，唾

① 钟叔河：《“用夏变夷”的一次失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第27页。

②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第74页。

③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第109—110页。

④ 杨汤琛：《域外书写与晚清士人的思想嬗变》，《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⑤ 斌椿：《乘槎笔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第119页。

⑥ 斌椿：《乘槎笔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第114页。

⑦ 斌椿：《乘槎笔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第117页。

⑧ 志刚：《初使泰西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第262页。

⑨ 钟叔河：《一部巴黎公社目击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2册，第290页。

余必盛以器。”^①“西国儿童，不拘男女，凡八岁不送入学者，议罚有例。故男女无论贫富，无不知书识字。而学堂之制亦善，有男学堂、女学堂、大学堂、小学堂，而各堂衣帽不一，其式如兵勇之号衣。成群结队而行，一望即知其为何堂者。”^② 这些描述虽然不免有夸大之处，但为当时的中国人提供了一幅相对准确的西方社会图景。

到同治末光绪初年，清朝对外使臣考察西洋，更多侧重考察西方政治制度，并注重与中国政治制度相对比。相对于斌椿、志刚、张德彝等人，刘锡鸿对西方世界的观察和分析要深刻许多。对于英国的富强，刘锡鸿从教育、专利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观察和分析。刘锡鸿认真考察了英国教育制度，“英人技艺争鸣，各树一帜。苟可经营以立业者，虽毫发之细，亦必推究其所以然；虽数万里之遥，亦不惮跋涉以寻求之。男女子自幼咸入学读书，天文、舆图、算法、杂学无不毕讲。十二岁以上，即皆能殚竭智力，以就一艺。”^③ 他还充分肯定英国的专利制度，“人知英人制造之巧，而不知其有所奖而成也。英人于物之不适于用，或适用而意犹未尽者，则竭其心思之力，广其耳目之助，不惜资本，不避况瘁，遍访天下，历试诸法，以务求其当。或数十年，或数十年，一旦有得，则以告诸白丁德亚非士（官名也，专管人之创制新物者）。验之而果济于用，则给以文据。凡夫人之效为此者，皆纳资于创造之人焉。由是遍告邻近诸国，亦官主持之。有私仿其式而不纳资者，则信罚。故一物既成，其利辄以亿兆计。非然者，几经求索以发斯秘，他人坐享其成，无所控诉，谁则甘虚费财力以创始一物者？故英国之富，以制造之多也。”^④ 刘氏所言不乏切中肯綮之语。

对于英国的议会制度，刘锡鸿也有相当深入的描述。“每新岁后，国主亲吉亲临议政院，集臣工士庶，询问政事得失，谕众公议；并刊示上年度支出入之数，俾共核算，名曰开会堂。”^⑤ 到具体的议会辩论时，“凡开会堂，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故其处事恒力据上游，不稍假人以践踏。而举办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成之。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⑥ 对于议院的作用，刘锡鸿认识也较为准确：“下议院绅士，为英国最要之选。号令政事，每由此起，而后上议院核定之。亦有倡议自上，而交议于下者。然必下情胥协，乃可见诸施行。绅主之，官成之，国主肩其虚名而已。”^⑦ 刘锡鸿对英国的财政预算制度、预防官员腐败的制度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些议论和表述体现了中国士大夫对西方社会的认知呈逐步加深的过程。

耿昇指出，海外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游记汉学”；二是“宏观汉学”，即“译注中文基本经典和全面笼统地介绍中国”；三是“经院式汉学”，即“将汉学纳入到了全人类整体的学术研究范畴当中”。^⑧ 实际上，耿昇所言用以说明西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完全适用的。斌椿、志刚、张德彝、刘锡鸿等晚清早期外交使团的西洋书写也可称之为“游记体西学”，虽然他们也做了一些中西文化的比较，但这种比较是非常肤浅的。究其原因，首先，语言不通，除了张德彝外，斌椿等人并不懂英文；其次，他们不具备西方文化的基本知识；再次，他们的行程短暂且匆忙，基本上属于走马观花式体验；最后，他们主观上也没有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的意愿。此外，他们接触到的大多是西方社会上层彬彬有礼的精英人士，故而对欧洲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意愿去感受西方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实际工作与生活，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他们的游记中基本上看不到任何关于西方社会负面和阴暗面的记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本人是“先进”“发达”“富裕”“文明”“进步”等词汇构成的“新西洋”形象的最初建构者，他们留下的材料又成为后来者继续进行“新西洋”形象建构的重要素材。而与之相反的是，同时期来华的欧美人士，其对中国的描写则充斥了“落后”“保守”“停滞”“半野蛮”等词汇，比如密福特描写英国公使馆梁公府：“一所住宅，位于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中心，却如同荒野，到处是狐狸、蛇蝎、鸡貂、黄鼠狼、喜鹊等。……公使馆最大的弊端在于其位置。要吸口新鲜空气，得骑一个多小时的马，才能出城，摆脱城里的臭气”。^⑨ 这与斌椿等人对伦敦、巴黎以及欧洲其他大城市的描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正是在这些大量负面词汇的堆积下，中西形象的建构出现了历史性的反转。

① 张德彝：《随使法国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2册，第438—439页。

② 张德彝：《随使法国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2册，第479页。

③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第99—100页。

④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第104—105页。

⑤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第79—80页。

⑥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第83页。

⑦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第102页。

⑧ 耿昇：《序》，密福特：《清末驻京英使信札（1865—1866）》，温时幸、陆瑾译，第1页。

⑨ 密福特：《清末驻京英使信札（1865—1866）》，温时幸、陆瑾译，第45页。

三、晚清早期驻外使团“新西洋”形象建构的跨文化解读

一般认为，“国家形象”由硬实力和软实力组合而成。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物质维度（即国家实力形象）与价值维度（即国家意识形象）两个维度理解国家形象的内涵。从物质维度来看，国家形象是指公众对国与国之间物质实力对比的认知，包含经济、科教、外交、军事、地理等多方面的认识。但从物质维度出发，无法对国家形象与国际关系做出价值判断，因此需要引入国家形象的价值维度，为国家的物质形象赋予意义。从价值维度来看，国家形象是指国家意识，即国家在国际上行为的目的。^①同时，国家形象也只有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对比中才能显示出来。约翰·巴罗（John Barrow）曾指出，“一个国家品质的好坏或优劣，只有拿别的国家作比较才能得出合理评价”。^②

事实上，同治时期的早期外交使节虽然对西方的物质文明不乏赞美之词，但内心深处仍然固守中华文化优越于西方文明的传统观念。虽然他们亲身体会了西方的工业文明，但对西方科技能否行于中国，大多持否定意见，这一文化心态体现了作为内生原创文明的中华文明在近代接纳先进西方文明的困难和困境。对于这种文化困境，密福特曾有十分精辟的论述：“人们纷纷褒奖日本的进取精神，批评中国的因陋守旧。尽管日本取得的巨大进步确实令人瞩目，但上述看法极不公正。要知道，日本从未创造过什么……日本的一切都源自中国……放弃的均非本国所创，也就无损国家尊严了”；“而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发源地。中国人有理由为此骄傲。”^③密氏所言，对于解读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之难，可谓精当之论。

对于西洋的政教，志刚认为西方的教化“不但无其父，并无其君矣”，认为西方要“德慧日开”，才能与儒学“不期合而自和者”。^④足见其认为儒学优越于西学的自大心态。虽然亲身体会了西方先进发达的工业文明，但志刚对于开矿山、修铁路等事务依然持排斥态度。如洋人问志刚中国为何不修铁路时，志刚答以铁路需要经过一些坟地，会有损孝道：“若以朝廷之势力，灭中华孝敬之天性，曰将以牟利也，恐中国之人性未易概行灭绝也”。客人继续问：“中国有官塘大路，其间并无坟墓，未始不可修铁路也。”志刚回答说：“官塘大路终年不断行人，若修铁路又将何地另开官塘大路以待铁路之成邪？此事或当相机而缓商也。”^⑤

虽然张德彝多次出使西洋，精通英文，且年纪轻轻，但其内心深处同样坚守中国政教、伦理和文化优于西方的观念。就这些问题，他在旅途中曾多次与西方人进行辩论。法国人严布尔在与张德彝交流时表示：“‘君来此（指法国）已三次，以我国教化比之，贵国亦似稍逊之。’彝诘其说，彼曰：‘我国男妇老幼相见，皆以接吻为礼，非为教化之国耶？’曰：‘若以接吻而言，我国父母之哺婴儿，往往有之，此系喜爱之意，不知贵国以接吻为何礼？’彼曰：‘此系恭敬之意也。’彝曰：‘若以此为恭敬，则不如我国跪拜为合宜矣。再，予之三次航海，虽不多见，少有所闻。以我国教化比之，贵国亦似稍逊之。’彼请其说，彝曰：‘父母生子，原望奉养终身，不意贵国之人毕婚后，即分居而另立门户。双亲虽老，视若旁人，子不侍父母，媳不奉翁姑，岂非少经教化者乎？’其人大惭，面赧而退。”^⑥在另一次与英国人白娄安对话时，当被问到“‘既来泰西三次，何不将各国有用之物，详细记载，归告众人，令其励学前进？’彝曰：‘公曾往华一游乎？’曰：‘曾驻华八载矣。’彝曰：‘既驻八年，则我国有用之物，亦必有所见闻。’彼曰：‘所知甚夥。’彝曰：‘谅必已告于众矣。’曰：‘尚未。’彝曰：‘然则已稟之于君主矣。’其人俯首无语。”^⑦张德彝还记述了他一次与法国富商士绅讨论的经历，据他说，“谈及三纲五常，众皆喜闻，且云：‘敝国风土人情，较贵国不如多矣’”。^⑧对此，钟叔河十分感慨地指出，尽管张德彝出身同文馆，但“同文馆并没有办成真正的新式学校，同文馆的学生也没有被培养成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一代新人”。^⑨

至于光绪初年出使西洋的刘锡鸿，尽管更为细致地考察了西洋文明诸方面的成就，且对西方政治制度也不乏赞美之

① 参见林仲轩编：《新时代高等院校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跨文化传播教程》，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62页。

② 乔治·马夏尔尼、约翰·巴罗：《马夏尔尼使团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37页。

③ 密福特：《清末驻京英使信札（1865—1866）·作者序》，温时幸、陆瑾译，第3—4页。

④ 志刚：《初使泰西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第281页。

⑤ 志刚：《初使泰西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第312页。

⑥ 张德彝：《随使法国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2册，第396—397页。

⑦ 张德彝：《随使法国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2册，第397页。

⑧ 张德彝：《随使法国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2册，第401页。

⑨ 钟叔河：《航海述奇的同文馆学生》，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第416页。

词，但其实从内心深处对西方文明更不认可。他认为西方的平等观念使得“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全未之讲，自贵至贱皆然”，是缺乏教化的表现。^①他批评“西人不知有父母，或谓耶稣教以天为宗，扫灭一切。凡为子者，自成人后，即各自谋生，不与父母相闻。闻有居官食禄之人，睽离膝下十数载，迨既归，仍不一省视者。”^②即使看到西洋的优越之处，刘锡鸿依然坚持传统制度。如当时在伦敦见到日本派遣的使者井上馨，双方交谈之时，“井曰：‘中国宝藏实多，何为货弃诸地，胡不效西法改弦而更张之？’正使未及答，余曰：‘且君之综司户部，亦尝革户部之弊政否？’答曰：‘甚愿与革，众不我从。’余曰：‘此非众之好为疑沮也。祖宗制法皆有深意，历年既久而不能无弊者，皆以私害法之人致之。为大臣者，第能讲求旧制之意，实力奉行，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若改弦而更张，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我中朝敢不以贵国为戒乎？金、银、煤、铁等矿，利在焉，害亦存焉，非圣天子所贪求也。’井唯唯。”^③刘锡鸿以祖宗之法不可更改为由反驳内部改革和学习西方。作为改革家的井上馨听了，明白与此等守旧之人谈改革无异于痴人说梦，于是也就“唯唯”不语了。面对中西方优劣的问题，刘锡鸿也有较多辩解。如刘锡鸿参观了英国议会的辩论，随行的英国翻译马格理认为：“中国尚伪，不说实话，不做实事。每有所议，心不以为然，口则许可之。及其见诸行事，又不如此办理，洋人最以是为愤恨。”对于这种中外交涉中中国人的作为，刘锡鸿辩称：“此高一层办法也。辩论易致忿争，维口兴戎，故含忍优容，以息争端而安天下。”而马格理反驳称：“面从心违，即诺旋背，正足启争。若据理直言，人即不服气，亦须服理。”刘锡鸿也仅仅是“闻言而姑颌之”。^④刘锡鸿在英国坐火车，称赞火车方便快捷，好处多多。而对于引进铁路到中国，刘锡鸿则在游记中多次坚定地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中国游客较少，造铁路制火车必至亏本，势不可行。”^⑤他还担心铁路为盗匪所夺，又称修铁路需巨款，“一铁路须银六七千万，因防寇而尽断之，则他时不易修复。若仅划去百数十步，巨寇何难填以度军，此即有利亦有弊之说矣。且创造伊始，中国奚能有此巨款？”^⑥对于借洋债修筑铁路，刘锡鸿也坚决反对，认为一旦“本利不偿，则兴兵勒取（指西方列强）”。总之他认为：“此皆非治国正轨，恐未可恃。”他还总结西方的科技称：“洋人医足疾，辄断其筋而续以他物。如此灭裂办法，其何能久。”^⑦刘锡鸿的保守立场和不想变革在早期清朝外交使团中显得格外扎眼。

在“新西洋”形象建构的第一个层面，即对西洋社会实际的描述与介绍，斌椿们的开创之功不容抹杀。但是在“新西洋”形象建构的第二个层面，即如何认知、评价、学习或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发展与进步，同治时期外交使团的外交活动，既没有给中国引来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资源，也没有对晚清政府的政治变革起到多少积极作用，故斌椿们的外交活动的历史价值也就显得十分有限。对此，陈恭禄曾指出：“斌椿年老力衰，懒于动作，身在外国，所处之环境，迥异于中国之社会。其所见闻多为轮船、火车及汽力之生活，高大雄伟之建筑，而无安谧俭朴之适意，其尤感受不安者，不通外国言语，不明其思想制度，宴会之时，目视男女共席，相交言语，而以中国固有之道德论之，则乱男女之大伦，而为夷狄之陋俗，自无深切了解同情之可能性。其原定计划，先往欧洲，后游美国，乃至欧洲不愿游美，乘轮而回，自无良好之印象。其所著之笔记，偏重于海程宴会，固无影响于国内。”^⑧陈氏所言，放之其他早期出使成员身上同样适用。

“中国的西方形象属于一种跨文化的观念史研究，重要的是透过中国的西方形象的表述探究中国文化深层意识。”^⑨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发明，文化差别是民族或族群之间的本质差别。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观、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⑩这个观念，中国古人也曾经反复予以阐发，其中唐人程宴说得最为明白：“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窺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⑪这就

①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第109页。

②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第182页。

③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第125页。

④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第126—127页。

⑤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第155页。

⑥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第156页。

⑦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第156页。

⑧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222页。

⑨ 王寅生编订：《中国的西方形象·前言》，第2页。

⑩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⑪ 程宴：《内夷檄》，董浩等：《全唐文》卷821，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093页。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华夷之辨”或者说“夷夏之辨”。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以文化来区别“华夷”，是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于周边、领先于世界在文化上的突出反映。“按发展和成熟的几乎任何一项标准来衡量，中国至少在2000年内如果不是唯一领先的文明社会，也是领先的文明社会之一。”^①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中华文明尤其值得骄傲的地方。然而，到了清代中期以后，中华文明却逐渐走向了其所以创造历史辉煌的两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开放”与“包容”的反面。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指出，“在1800年，中国人认为自身就是世界，认为可以环抱世界，直到1840年这种感觉仍然存在。”然而，历史的发展是残酷无情的，“到1900年这种感觉则消亡了”。^②之所以出现这种极端的变化，正是中西之间基于国家软硬实力的巨变进而导致国家形象建构出现了位置互换：“西洋”从“蛮夷”摇身一变而为富强先进“文明之邦”，而中国则从“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成为欧洲人眼中的“半野蛮”国家。我们拉长历史镜头可以发现，早在乾隆时代，中国就已经被视为西方国家的猎物了。对此，法国学者雅克·布罗斯（Jacques Brosse）深刻指出：“对于西方人来说，国际贸易从此之后就超过了其余全部考虑。中国具有了一个既落后又无法发展，拥有巨大和有待于掠夺的市场及有待于雇佣的劳动力源泉之形象。总而言之，中国形成了一种殖民地的形象，开始取代由圣贤们治理的帝国之理想化形象。在乾隆临朝时期，情况始终如此。”^③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是按照此种逻辑逐步展开的。

四、结语

通过简要梳理斌椿、志刚、张德彝、刘锡鸿等人的旅西游记可以发现，在器物层面，从斌椿到刘锡鸿等人都能够认识到西方社会先进发达的一面，对火车、轮船、枪炮、工厂、城市都有细致的描绘，多有称颂之语，显示出同治朝使者对西方工业文明成就的感性认识；在政治制度、国家治理、社会风土、社会管理等层面，也流露出一定的欣赏和赞许之意。然而一旦涉及中西文化层面，从斌椿到刘锡鸿诸人对中国传统政教、伦理、文化等又持坚决维护之态度，显示了不同文化之间交往交流或者说跨文化交流的困境。

从“同治中兴”到“戊戌变法”，经过几代人的更替，中国思想界逐渐形成了“新西洋”的形象建构，人们普遍接受了“西方进步”“中国停滞”的观念，中西形象出现了历史性逆转。进步使西方从“野蛮”迅速发展至文明，“停滞”使中国从文明逐渐成为西方人眼中“半野蛮”国家。改造世界，必须首先改变改造世界的观念。近代以来尤其是同治以来随着中外交往的日趋频繁，中国人在建构“新西洋”形象的过程中，一方面逐步改变了自身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也逐步形成以“新西洋”为模板的世界观念。改造中国传统观念的世界观念，是西方现代世界以进步为核心的、以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划分各民族国家等级秩序的世界观念。西方现代文明的优越不是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是现代的。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判断，捍卫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几乎是所有民族的一种本能。这样，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因为上面的原因，文化冲突和矛盾也就无法避免。面对矛盾和冲突，一般存在四种态度：一是坚决捍卫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信念，认为对方是完全错误的，并且逼迫对方服从自己，这就会导致战争和冲突，近代西方列强对待中国即如此；二是中止对话，用传统把自己包装起来，近代中国守旧派就是这种态度；三是有选择、有限度地接纳异质文明，但其目的仍然在于维持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比如近代中国颇为流行的“中体西用”模式；四是积极与异质文明进行交流互鉴，吸收和借鉴异质文明中的优秀成果，并将其融入自身文化传统之中。前三种态度和做法并不能真正消除文化危机，最终也必然会走向失败和消亡，唯有第四种态度才能使固有文明得以存续并不断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许丽梅）

① 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②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转引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99页。

③ 雅克·布罗斯：《发现中国》，耿升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95页。